

意外或偶然

——报人读史札记

田东江 著



□ 商務印書館

意外或偶然

——报人读史札记

田东江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田东江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 - 100 - 04685 - 8

I. 意… II. 田… III. 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K2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6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意外或偶然
——**报人读史札记**
田东江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 - 100 - 04685 - 8/Z · 54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3/4
印数 5 000 册

定价：30.00 元

序

鄢烈山

东江兄嘱我为他的这部书稿作序，我迟迟不敢下笔。文章在报上发表时，我大多认真地看过，收获颇多，写读后感没问题，作序又是一回事了。不是畏他学位比我高，我才疏学浅有自知之明，却也不乏粪土当今某些博士专家的狂傲；不是畏他饱读“三色书”（我知他十多年来，苦读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文史政经非生光化电，见仁见智，普通人都可以掺和几句意见。而是总觉得，作序是一件太端庄不可不慎的事，何况这书是由“商务”出的。

东江说你不是给一些杂文和时评集子写过序吗？我的这个集子也不是什么学术专著，是杂文集，不过是历史杂文罢了。这样说来，我作为一个资深写手，把他当作一个写杂文与时评的文友，互相品评一番，那就未尝不可了。

这本书稿选自作者 1998 年初至 2004 年底的作品。上编选于《野史新说》专栏文章，都是古人古事，却一望而知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你看这些标题：《流产的“裁汰胥吏”》《“上计”，官出数字之始》《“言路虽开犹未开”》《“省官不如省事”》《索贿的方式》《“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当“名片”左右办案》《官与妓》……哪篇不是讲的当下眼底事？作者的感触来自今天的生活，典故只是“起兴”的触媒和观点的载体。之所以有这种“似古实今”的文章，从社会客观条件方面讲，是因为中国尚未走出“前现代”，借用鲁迅的话说，人心依然“古”得很，因而古今可以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从人性（本于兽性，文明赋予人一定的“神性”）这个根本点讲，别说三千年五千年，恐怕三万年五万年，古今也是相通的，通古今之变才能究天人之际（有一种说法，

“天人之际”即“道心”与“人心”的关系)。而东江兄之所以爱拿野史做文章,一方面野史是他的嗜好,谈史是他的看家本领;另一方面,他也是有意为之。他曾借明人叶盛《水东日记》里的话说,“信(正)史诚未足信者矣”,“有欲书而不得书,有欲书而不敢书”,而野史在某些方面可以纠正史之偏,补正史之不足。比如这篇《文彦博的逸事》,说的是宋相文彦博在成都知府任上时,为掩饰他的风流丑闻,设美人计搞定钦点“伺察”使者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官场监督的局限性。这种故事,在正史中为尊者讳掉了,从野史中拿来开讲,在令人会心一笑之余,难免心有所动,亦或有所思。东江兄有篇《只恐有人还笑君》,取材宋人范浚的《六笑》诗:“客言莫漫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嗔。螳螂袭蝉雀在后,只恐有人还笑君。”他以古人为鉴,怕的是后人还要笑今天的我们!

与上编的读史笔记体例不同,下编露出了时评的本相,多是从今天的新闻说起,给人一种追根溯源的历史纵深感,用他的话说,这叫“今古齐观”。

今古齐观,打通古今,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在较浅的层面,博闻多识,可以增进我们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克服褊狭、固陋和愚黯。比如:读《文身》一文,我们知道,文身乃古已有之,动机有高下,功用有正邪,不可一概否定,应以平常心视之;读《前苏联·故明》,我们知道“前苏联”的用语一如“故明”之可笑,识见还不如康熙皇帝;读《之乎者也》,我们知道强作古人(古文)之滑稽,不会赞成今人搞文言文编纂清史这种贻笑后人的荒唐事;而读《家仆·权仆》这样的文章,能给我们一双洞明世事、辨奸识恶的慧眼。

在较高的层面,“今古齐观”是我们的精神资源,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思维水平和道德层次。比如,这本书的书名叫《意外或偶然》,取之于下编同名文章的标题和立意,作者以古今事例阐明了这样一个哲理:“‘意外’或‘偶然’之中,往往蕴涵着某种必然。”其实,本书中不少篇什,比如,开卷《可以避免的恶果》、《流产的“裁汰胥吏”》也隐隐阐

述了这样一条富于哲理的历史规律，有助于我们今天加深对现代文明制度建设必要性的认识。而《是非之心》（明人魏骥说过：“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关于“包二奶”》（在容许一夫多妻、有官妓的封建时代，好色悖义亦为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人君子所不屑）这样的一些文章，为我们树立了做一个大写的“人”的道德标杆。

我非常欣赏东江兄的一句自我表白，即“六经皆我注脚”。就个人智慧而言，我们绝大多数现代人比不上孔孟庄韩，比不上李杜苏辛；即便博雅好古赛过东江兄，论经史子集的古文功底，也难比百年以前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一般读书人。但是我们有幸生活在没有皇上的中国，有幸生活在华夷混同的“地球村”和万里无碍的信息时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这些基于普遍人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已经不可抑制地在我们心田生根发芽。正是有了这样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垫底，我们才能以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的文化典籍，古为今用。

这两年，神州大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读经”热。这当然不是坏事，但看热为什么热，读又怎样去读。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挖断自己的文化根脉，也不能妄自尊大，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我愿有更多人像东江兄一样，秉持“一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林毓生评鲁迅语），“心正则笔正”（田东江引唐人柳公权语）地写下更多的“今古齐观”文章，发掘和用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

2005年8月26日

目 录

上 编

可以避免的恶果	1
流产的“裁汰胥吏”	2
公孙轨的“独不探把”	4
唐朝的一次“跑官”	5
琼之“陋”俗与贪泉冤案	7
“以酬廉吏”与“量增官俸”	8
武三思的“善恶”逻辑	10
“上计”，官出数字之始	12
“居官以正己为先”	13
朱全忠的“指柳为毅”	15
官场的猜疑	17
曾铣“上疏”的悲剧	18
腹中物	20
“青词宰相”	22
“言路虽开犹未开”	23
反躬自责	25
“恐人知”与“恐人不知”	27
“省官不如省事”	28
官员的科场舞弊	30
崔暹遇骂与陆岩挨打	32
挑地方当官	33

省察“杯中物”	35
王世充的工作作风	37
索贿的方式	39
取悦之道	40
“万世辨奸之要”	42
书法是门艺术	44
“不可不问，不可深问”	45
有所惧	47
印把子	49
“能说话者”	50
张綵的门面话	52
“平生要识琼崖面”	54
祖珽的“不负身”	56
文彦博的逸事	57
关于“包二奶”	59
科举中的“竞争”种种	61
杨荣的“进谏之方”	62
赵大鯈的“劾贪”态度	64
“未有无士之时”	66
“润笔”中的人生	68
“不与徐凝洗恶诗”	69
邓绾的“笑骂从汝”	71
王安礼眼中的“小人”	73
碑刻的时运	75
吃河豚之争	76
洁癖	78
耐弹的“刘棉花”	80
“居官必如颜真卿”	82
下臣为何“以货事君”	84

诈与诚	86
“热官”还须“冷做”	88
范仲淹的“自计”	90
不能欺、不忍欺与不敢欺	92
“贪不在多”	94
做官与做贼	96
话外音	98
“谥”之褒贬	100
提倡“语简事备”	102
能、逞能、劝人逞能	104
“何用碑为?”	106
“声色”事	108
“悻门如鼠穴”	110
“清白信居官之要”	112
“推下爿磨”	114
官讳	116
科举录取之怪状	119
居家之俭与居官之廉	121
政绩的考察问题	123
出行未必得“警跸”	125
不敢、不敢	127
窥“哭”	129
当“名片”左右办案	131
“谣言”漫议	133
周锡恩的“无行”	135
阮大铖的“推之不去”	137
正己之难	139
孝行的名与实	141
王恕的“指窖止贪”	143

“人无百事皆行”	145
官与妓	147
阎立本的“伏地吮毫”	149
裴宽自律的可贵	151
荔枝叹	154
“枪手”考	156
奔竞之风	158
名人崇拜	160

下 编

意外或偶然	163
设誓	165
胥吏的能量	167
纪晓岚	169
取名	171
贬损与虚誉	173
考试录取	175
是非之心	178
暧昧之事	180
只恐有人还笑君	182
睡	184
丑女	186
改名	188
互嘲	190
无知者无畏	192
文身	194
无聊的闹剧	196
象牙笔	199

景点之争	201
过目不忘	203
下围棋	205
虢国夫人拆迁	207
家仆·权仆	209
须知痛痒切吾身	211
古人诗句犯师兄	213
封杀	215
酬恩报怨	218
醉乡别有一天地	220
考绩	222
元旦	224
山口百惠与杨贵妃	226
言清行浊	228
之乎者也	230
影射	232
杀情妇	234
外号	236
秦桧墓·疑冢·闹剧	238
自比	240
长相	242
假冒	244
助哭	246
叶公好龙	248
印文	250
陶侃癖	253
天×星	255
诚	257
绍兴酒	259

改名(续).....	262
端午节.....	264
酷暑.....	266
剽窃.....	268
赝品.....	271
口碑.....	273
庸医.....	275
不认识.....	277
前世.....	279
直言·多言.....	282
胡子.....	284
借书·还书.....	286
陋吏铭.....	288
中秋.....	291
重名.....	293
憾事.....	295
乐坊.....	297
文字何曾值一钱.....	300
鸦片.....	302
前苏联·故明.....	304
鹦鹉.....	306
六字箴言.....	309
做事·做官.....	311
下围棋(续).....	313
读书.....	315
后记.....	318

上 编

可以避免的恶果

官吏的任免、升迁，是国家政府行使职能的一个常态。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选拔官吏的准则各有不同，但只要那个时代还算得上正常的话，总是有章可循的，或奖优罚劣，或新陈代谢。提拔什么样的人，该人将来为官一任，对一方造福还是贻害，可能无法预料；但在提拔之前，该人的现有品质如何却是可以考察到的。作为相对客观的标准，提拔准则较之单纯的长官意志，毕竟“保险”得多。但是，如我们从历史中所窥见的，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恶果，却恰恰因为长官意志而由人民吞咽苦果。唐德宗提拔严砺，是为一例。

唐德宗是把严砺由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超授”为兴元尹兼御史大夫。超授，也就是越等授官，而非“按部就班”。兴元尹不是个小官，德宗曾避难于兴元，那里起过“陪都”的作用，所以他“将还京师”时下诏此地升格，“官名品制同京兆”。但是严砺的问题不在官大官小，是否破格，也不在于他是否“资历甚浅”，而在于其人“人望素轻”，“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完全是个德行俱差的人物。声誉先已不堪，又焉能委以重任？所以拾遗李繁带头向皇帝直陈：“昨除拜严砺，众官以为不当。”某官云何，又有谁人在场，一一列举。皇帝与大臣的意见不统一，甚至遭到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下，皇帝当然可以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怕的倒是作出一副民主的样子，假惺惺地要听取民意。德宗遣三司核实李繁的汇报，实际上是去抠李繁的字眼，转移问题的焦点。比如李繁说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他们就在苗拯究竟说了几次上做文章；调查结果苗拯承认“未言三度”，许孟容

等作证“实言两度”。但连苗拯本人都认为问题不在于他说了“几度”，而在于自己的观点是不该提拔严砺，所以他坚持“请依众状”。

严砺最终还是被提拔了。《旧唐书》载，他“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别说百姓了，即使为官者与之不睦，亦诬奏贬之，十足暴露了本性。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后果。在他死后，御史元稹奉使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而严砺在任，不过才十年时间。

严砺这样的人物能够青云直上，得到皇帝直接提拔，他本人显然力有不逮，全仗着他的宗人严震充当“保护伞”。严震于德宗立有大功，他死的时候，德宗曾“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这样一个号称“纯臣”的人物，却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一纸“遗表”，准则的大厦轰然倾塌。严砺事发，“诏徵其赃，以死恕其罪”。死了，倒成了好事，不用负什么责了。

客观地看，严砺的提拔亦与封建国家本身的阶级意志相违背。谏臣之设，在于直言，触动“龙颜”，实不可免，但维护的仍是本集团的利益。然而苗拯、李繁等因为直言，第二天即被贬出京师，此种事实，足以助长后来者曲意阿从，尸位素餐。不过，从封建国家“人治”的本质来分析，像提拔严砺这种貌似可以避免的恶果，实际上很难避免。

1998年1月19日

流产的“裁汰胥吏”

宋朝的官吏之多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其“冗吏”问题不仅为后人所诟病，就是当时，也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宋哲宗时翟思奏道：“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官吏多了，不仅是财政支出的增加问题，事情反而更不好办了。但是具体到怎样精兵简政，却是诸多努力都不成功。决心大的，方法不合国情；合国情的，犹犹豫豫，躲躲闪闪，又几乎没有变革。哲宗元祐年间有过一次。

以吕大防为代表的主张“趣废其半”，把官吏处理的日常事务“以难易”分为七等，每等定出一个分值，“积若干分而为一人”。这种办法是按工作量设职位，多余的一概裁去，立竿见影。以范百禄、苏辙为代表的则主张“渐消”，慢慢来，所谓“阙吏勿补”。这种办法要求单位部门先“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者勿补，及额而止”。这就是说，别管你是什么素质的人，既然已经占了这个位置，没出什么事，又活得好好的，那就慢慢耗着，耗下一个少一个，反正终有耗到“及额”的那一天。

面对积重难返的问题，吕大防是果敢的，况且当时大权在握，断然否决了拖泥带水的后者。然而没过多久他却不得不屈服于“阙吏勿补”，因为他犯了众怒，只知道大刀阔斧，全然不顾及国情。

“阙吏勿补”照顾了所有现职人员的切身利益，是讲“情”的。范百禄说，“功虽稍缓”，但“废半则失职者众”。苏辙说：“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这一个“众”字两个“大”字，道出了可能的严重后果：那么多养尊处优的人一下子饭碗没了，不闹起来才怪！而“阙吏勿补”的好处，正可使“现吏知非身患，不复怨”！反正改革不到自己头上，不会致人惊慌，相安无事，社会也能因之安定。所以此法尽管消极了些，却又不失为一副“良方”。

其实，吕大防不该忘记，此前几十年范仲淹已经碰过类似的钉子。仲淹提出有名的《十事疏》，前五项就属于澄清吏治。他选监司，取过班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干脆得很。有人敲边鼓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路，宋行政区域名，犹明清时的省。）一家丢官的损失总比一地百姓的可能受害要小得多吧。道理是这个道理，然而仅仅不到一年，仲淹就在因此而产生的强大反对声浪中不得不“仓皇乞身而去”，仁宗心里明白，却保护不了他。范仲淹是想痛下决心，行不通罢了。

“渐消”法“裁汰胥吏”，当然也没能奏效，讲“情”的事不可能寄予希望。但是“冗吏”问题必须解决，回避不得。它不仅是“财政之蠹”，而且是政治的绊脚石，北宋仅有的两次大的变革，均因之而失败。范

仲淹庆历变政，矛头直指，不行；王安石熙宁变法，从经济入手，试图绕过去，同样不行。且“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钱穆《国史大纲》）。可见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带来的是何种惨痛的后果。

1998年2月9日

公孙轨的“独不探把”

皇帝要干什么，有时纯粹是心血来潮，兴之所至，但这种无意之举在客观上往往连带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皇帝的赏赐，就并无什么标准可言，却可能如同给大臣们出了一道测试的题目，不同的举动代表了不同的答案。

北魏世祖拓跋焘平掉赫连昌，令手下任取其府藏金玉，结果，“诸将取之盈怀”，而公孙轨“独不探把”。“独不探把”，也就是一文不要。无独有偶，隋文帝杨坚有次赏赐公卿，也是干脆让他们自己到“左藏”（即国库）里面去拿。多数人同样极尽所能，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唯有厍狄士文只拿三匹绢，“口衔一匹，两手各持一匹”。文帝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余无所须。”意思是说，这么多就足够了。

公孙轨和厍狄士文，两个人的所为都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但这种行为无疑很受赏识。因此，隋文帝是“别赉遗之”，另外又给了厍狄士文补偿；世祖则被感动得不得了，当众对公孙轨“探金赐之”，并夸奖道：“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显廉于人，是要把公孙轨树为廉洁的榜样，期望值可谓不低，其意义已经不在于鼓励个人而在于示范全社会了。

这样看来，在财物的诱惑面前起码有了三种答案，因为有“任取”的特定前提，怎样的答案其实都不为过。然而比较起来，公孙轨“独不探把”的境界无疑还是最高，甚至高过厍狄士文的“口手俱足”。但这毕竟是一种“测试”，拿多拿少甚至不拿，还只是在皇帝面前的表现，实际做得如何还有待日后行动的验证。公孙轨的行为证明，他恰

是寡廉鲜耻之辈。

“取之盈怀”的人不用讲了，即使要说他们“贪”，他们也是“贪”在表面，假如一定要防范这样的人，也有明确的目标。库狄士文呢？不仅当时“手口俱足”，而且日后也表里如一。他上任至州，发摘奸吏，尺布斗粟之赃，无所宽贷，连自己的儿子“啖官厨饼”，也“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二百，步送还京”。公私分明，绝不含糊，实践印证了库狄士文的品行高尚，是真正意义上的榜样人物。公孙轨则不然，他的“廉”只是廉给皇帝看的，在实际工作中，与“廉”字根本不相涉。世祖北征，让他组织雍州的民驴运粮，他趁机“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在上党，他“为受货”而“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他的“受货”程度又怎样？“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从“单马执鞭”发展到“从车百辆”，公孙轨哪里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贪官，算得上大贪、巨贪了！这个当初作为“廉吏”推介的人物，令拓跋焘后来难堪得很，他咬牙切齿地说：“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诛之。”

可见，官吏的廉与不廉，首先不是凭自己说了算的；公孙轨的事例又告诉人们，即便是自己做的，也要考察时间场合之类的背景。像公孙轨这样的沽名钓誉之徒，在皇帝、同僚面前“独不探把”，暗地里极尽贪赃枉法之能事，非常具有欺骗性，不可不防。

1998年3月23日

唐朝的一次“跑官”

“跑官”之名是今人的提法，行其实者代不乏人。唐朝的陈少游便深谙此道。所谓“跑官”，当然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当官。魏人裴植尝曰：“非我需尚书，尚书亦需我。”此等豪迈与自信，是“跑官”人的致命伤。他们想当官，想当更大的官，想按自己的意愿当官，或者想当有油水的官，因为正常的渠道行不通，便只有施展自己的“活动”本